

◀（上接 9 版）

印三千册。到严复索款时,初版实际销量只有一千二三百册,远未到可以预提译利的三千册,因此没有给严复分利。此时为解决问题,俞复和廉泉商议出一个变通之计,即先由文明书局垫付译利规元一千两,四千印花以内的书由书局继续销售,没有印花的二千册算作书局代印,由严复收回,自行发售。

此议显然不符合约定,严复知道后更加不满,十一月再次去信交涉,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文明书局要么如数支付六千册的译利,他可以额外赠送二千枚印花,要么废约交回版权,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大概他在信中还提到诉讼的可能性。廉泉遂于此月二十九日用一夜时间,回复了一封长信,对严复的指责逐条辩解,出人意料地要求废约,表示即使发生诉讼,他也会坚持废约。他建议已经售出的书按约定提取译利,剩余部分由严复取回自售,文明书局则登报声明不再经销此书。至于书局由此吃大亏,“既立约在前,亦复何言”,果真亏损,由他个人赔补。

廉泉主张废约的理由,是盗版书低价倾销,让文明书局难以打赢价格战:

盖当时立约时,不知版权如此难保,故一一唯命。今因版权不能自保,若不及早奉还,由先生自行查禁,日后销路盖不可恃,先生所失之利甚大,泉于先生何忍避废约之名而坐观成败乎?……先生倘采纳鄙言,将全收回减价出售,则此书虽有翻版,亦可自销。若照原约办理,则吾局实难减价而销路绝矣。此非当时立约时所及料,异日万一因此涉讼,泉亦力持废约之说,因官府不能保护版权,安能禁吾废约?此书版权一日不交还,泉心一日不安,请及早与商务馆定约,泉奉示后当电属沪局将全书即日交付,其余各地寄售及京保两局所存之书当陆续交付该馆。(《严复集补编》第 378 页)

从廉泉信中看,这次风波也有同业竞争因素在内。文明书局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商务印书馆,而张元济既向严复通报《群学肄言》的实际印数,又说文明书局每部书印费五角价格过昂(“张君来函所论印资,泉亦不辩,因先生日后必自印也”),商务印书馆还要替严复销售此书并重新出版,多少有些“挖墙脚”的意思。至于廉泉说“谗间者”不可不防,当有所指。

廉泉的回复言辞恳切,又态度坚决,看来最终说服了严

复。虽然此时严复的新译作如《社会通论》《群己权界论》等都拿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但他与文明书局的《群学肄言》合同并未废除。报纸上未见文明书局不再出售《群学肄言》的声明,反倒是售书广告中一直将其列为“本局出版之书”,到后来价格还有所上涨,说明存书已经不多。从再版更换印花、所钤印章由“侯官严复”改为“严复”,以及将初版的“版权所有”声明改为“著作权所有”并不再钤盖书局版权章等情形看,严复应是接受了文明书局提出的“变通之计”,将四千枚印花之外的再版本收回自售了。这次合作虽然过程曲折,销售不如预期,但他应该没有受到大的经济损失。

版权风波之后,严复与廉泉并未反目成仇。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廉泉之妻吴芝瑛因义葬秋瑾,被御史常徽奏请严拿惩办,一时舆论大哗,声援尤为有力者,当属美国女教士麦美德在天津《泰晤士报》上的英文报道。事件稍稍平息,严复即将麦美德文章译成汉文,又作《廉夫人吴芝瑛传》,发表在《大公报》上,表彰吴芝瑛的义行、品格和她首开女子参与外事先河的勇气。这是严复声望最高的时候,借重他的译笔和文笔,身处险境的廉、吴夫妇得到有力支持。民国二年(1913),廉泉请吴观岱绘制《津楼惜别图》,征集友人题咏,严复先题七绝三首,再题五律与七律各一首,足见二人论交,不以利害义,诚所谓古之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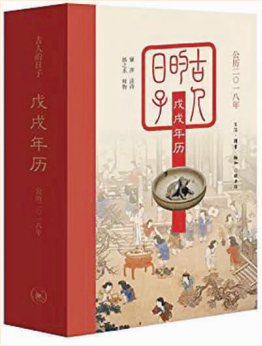
在这场激烈而复杂的版权保卫战中,文明书局难言胜利。虽然它惩处了几个盗版者,也未失去《群学肄言》初版的版权,但流失了严复这个重要作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廉泉急切要见严复,想的还是商谈再版《群学肄言》并到日本印刷平装本的事。版权风波一起,此事无法开口,严复的新书从此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接受严复开出的条件,认真保证他的版权利益,使他获得可观收入。后来严复又入股商务,先持有 400 股、后增加到 500 股,每年分红都在七八千元之数。民国八年,严复政治失意、老病侵寻,尚能在北京一掷七万元购买住宅,资金多来自他在商务印书馆的版税和股息。

经此《群学肄言》一役,中国的版权保护在实践层面取得局部成功,并推动了制度层面的法律在数年后出台。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颁布《大清著作权律》,严复与廉泉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作者为《金融时报》编辑）

秦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廉萍读诗、扬之水释物：《古人的日子——戊戌年历》，三联书店2017年11月版。



日历大约是用来撕的,时序已届暮春,还举出这本作为读物的年历,自然应有特别的缘由:那就是它和太多间架森严的著作相比,显得尤为可读——因其不翕翕以合群、不汲汲而趋时,不着意把自己纳入学术史的洪流中讲圆、讲全、讲出各种深文大义;平平实实地看图说话、因诗索解,读者自可在日复一日的寸累铢积中,把碎金散玉勾连成华章灿陈。负责释物的扬之水在不同的场合都曾对“定名”下过定义,是对“当时的语言系统中一个稳定的最小单位”的语词界定,这本年历正是对这些“稳定的最小单位”的解说。比如斗草,人人读过晏殊的词句“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晓得古时有踏青斗草的习俗,但究竟这游戏是怎么进行的,恐非人所习知。作者分几日展示了山西博物院藏仕女彩屏和镇江丁卯桥出土银瓶上的图案,“春困厌厌,抛掷斗草工夫”的女子,“童夸斗草赢”的小儿,于是便各自从纸上鲜活了过来。扬之水曾经说过,喜欢白居易和陆游的琐碎,喜欢他们像日记一样,记录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琐琐细细。这样的琐琐细细,正可体味出世事人心的幽幽曲曲。以名物研究建构一个文学的、历史的新叙事模式是作者的心愿,在此之前种种零散诗句文意的会通、海量实物图像的摄取,正可视作资料长篇之累积;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精彩。

甘慧杰译：《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上海人民

学人在读

出版社 2016 年 12 月版。



此日记手稿之难译,熊月之在前言已说之甚详,所以“序不写得长一些,压不住这么厚重的稿子”,良有以也,亦足以见出译者的功力和愿力。日记中的掌故,比如传碗而食、不加洗刷的中国餐馆,比如清末上海文人喜欢在四马路的风月场所宴请朋友、商谈事务,比如对大谷光瑞的人格早已有“不可信任”这样严重的批评,不仅可资谈助,也是对近代社会的第一手描绘,足资研究者采摭。以此日记与同时代其他记载相互参观,颇可见宗方记述之详实可信。略举一例,宗方小太郎与郑孝胥交情甚笃,郑孝胥当上伪满总理后访日,还专程去祭扫宗方之墓,以《宗方日记》中所记录的两人会面为线索,核以《郑孝胥日记》,自 1899 年 11 月 25 日第一次汉口会晤起,郑氏靡不有录,劳祖德整理的日记文本精确可靠,于焉可见。而以海藏日记参读宗方日记,译者乃有日本已刊布的《宗方小太郎文书》中常常出现的“宗方代理”乃是波多博之发现,疑窦冰释,诚一快事。偶亦有可凭宗方日记对海藏日记之文本稍作修正者,如海藏日记 1908 年 2 月 8 日条“座有徐芷生、陆纯伯、胡二梅及日人宗方畚野”,小字注“云是大学教习,将赴德国”。按之宗方日记,畚野即宇野哲人,此日正与宗方同赴宴会,之后 5 月 20 日条又提到宇野哲人赴德留学一事,则此处“宗方”“畚野”之间当以顿号隔断。此日记原稿藏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始于 1887 年 1 月 3 日,止于 1923 年 1 月 15 日,是首次完整翻译出版,有心者倘能再为其编制人名字号索引,研究者参以已出版的近代日记、尺牍、中日笔谈资料,或能钩写出近代史上的另一番面貌。

罗福葆编纂,萧文立、萧一苇整理：《历代琴谱过眼录》，重庆出版社 2017 年 8 月版。



《历代琴谱过眼录》的作者,即查阜西《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叙》中称谢共襄参订缮校之“罗子君羽”,时为查氏所聘之助手,协助搜集整理古琴文献资料。按罗福葆字君羽,罗振玉第四子,其父目之为“办事人才”,而他一生成绩,正可证明乃父识人之明,在协理事务中能屡有创获:增补《碑别字》而作成《碑别字续拾》,翻译日人荻生徂徕的《琴学大意抄》,而此《过眼录》之成,亦可视为辅佐查阜西编撰《琴曲集成》之副产品,因所见材料“多属海内孤本,庋藏于图书馆之善本室者,更非一般人能阅读”,故有此作。罗福葆于琴学一事,用心素见细密,如编《琴曲辑览》时,提出《琴苑》之《云竹榻》即《大还阁》之《古交行》一说,为查氏所采用。《过眼录》著录琴谱 149 种,迳录序跋 427 篇,施以句读,间附考辨。誉清稿本据说存于中国音乐研究所,今整理者以罗氏家藏原稿本为底本,据《琴曲集成》影印原书校勘审定,并撰写长文《罗福葆与〈历代琴谱过眼录〉》,将《过眼录》与罗氏协编的《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琴曲集成》《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加以比勘,则是书之功用和发明,昭然若揭,而罗福葆困厄穷迫中亶亶不辍之著述,终得完整刊行,实为琴学之幸事,整理者之功亦大矣。琴书序跋题词多为手书上板,加之年久漫漶,迳录不易,整理本中或有误识,如第六号《太音大全集》题辞中“攻鐻”当作“攻鑽”,“左庭”当作“户庭”;标点亦偶有可商之处,均须重版时再加修订,以期成为琴学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